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 批判继承

周德昌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我国古代(先秦至清)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方法、德育理论和方法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应当批判和继承的一些方面,引述的资料较丰富,是一部有一定水平的教育思想史著作。可供师范院校学生学习我国古代教育史参考。对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和了解古代教育、教学思想,也有一定帮助。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

周德昌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环西路 10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5,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书号: 7232·120 定价: 0.53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教学思想的发展和批判 ·····	(1)
(一) 良知、良能·····	(1)
(二) 博学、慎思、笃行·····	(10)
(三) 自求、自得,体察,涵养·····	(19)
(四) 读书穷理·····	(29)
(五) 皓首穷经,死守章句·····	(38)
第二章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46)
(一) 学而知之·····	(46)
(二) 闻、见、知、行·····	(53)
(三) 积靡、注错·····	(64)
(四) 两论相订·····	(69)
(五) 学以致用·····	(78)
第三章 中国古代德育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批判 ·····	(87)
(一) 存天理、灭人欲·····	(88)
(二) 知、情、意·····	(93)
(三) 忠、孝、仁、义·····	(104)
(四) 克己、内省、存心、养性·····	(110)
(五) 践履、躬行·····	(115)
第四章 中国古代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	(122)
(一) 教学相长·····	(123)
(二) 启发诱导、融会贯通·····	(133)
(三) 因材施教·····	(140)

【四】 锲而不舍，专心致志	(145)
（五） 循序渐进	(149)
（六） 由博返约	(153)
（七） 学而时习，温故知新	(160)

第一章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教学思想的发展和批判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古代的教育家们在长期的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育、教学理论，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工作经验。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哲学战线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样地在教育、教学理论领域里反映出来。古代的教育家们从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教育、教学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

本章只是初步地就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教学思想发展的若干问题，以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的基本观点为线索，进行整理概括和分析批判。以求阐明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教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

本章对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教学思想的发展着重论述下列几个问题。(一)良知、良能；(二)博学、慎思、笃行；(三)自求、自得、体察、涵养；(四)读书穷理；(五)皓首穷经，死守章句。

(一) 良知、良能

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实质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过程的一种形式，关于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来就贯穿着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人们首先接触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的问题。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究竟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这个问题，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教育家中间一直争论不休，其焦点概括起来说就是“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之争。

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到底是遵循“生而知之”的求知路线，抑是遵循“学而知之”的求知路线，这是唯心主义教学思想和唯物主义教学思想的分水岭，两者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奴隶暴动风起云涌，奴隶制日趋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兴起和确立。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当时作为奴隶主阶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丘第一次提出了“生而知之”的观点，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特点，在于宣扬“圣人”即统治阶级的大人物的智慧、知识、才能和道德品质都是先天就具备了。这些人实质上就是他所谓的“天才”，他们可以不接触实际，不积累经验，不需要后天的学习，生来就具有正确的知识。孔丘的这个观点可说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典型（孔丘的教育思想既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关他的“学而知之”的论述，这里暂不涉及）。

孔丘根据这一“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理论和原则，人为地按照所谓知识才能具有“天赋程度”把人分成四等。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这是说，生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的；经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是次一等的；遇着困难然后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着困难仍然不愿意学习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下等人了。在这里，孔丘把奴隶主贵

族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引进了认识论的范畴和学习领域。

不仅如此，孔丘还更进一步把所谓“生而知之”的人（即奴隶主贵族中的大人物）捧为“上智”，又把从事生产劳动并被剥夺了文化教育权利的劳动者和奴隶们说成是最没有知识的“下愚”。他并且断然宣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贵族永远聪明，劳动人民则永远愚蠢，二者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在这里孔丘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宣扬天赋才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一种为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位合理性辩护而披上的一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外衣。

在这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孔丘在教育上主张对奴隶们施行愚民政策，他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只能叫老百姓听从指挥，绝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知识，懂得道理。“圣人生知”和“群氓无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鼓吹“圣人生知”者必然宣扬愚民哲学，吹捧统治阶级的大人物具有天赋的才能，那么劳动人民自然就是“群氓”了。

但是作为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的孔丘，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奴隶主贵族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他又主张“养民”、“惠民”、“教民”。自然，他“教民”的目的是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惠则足以使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就是要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

孔丘“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观点，到了战国中期，被孟轲扩展成为更为精致的先验的“良知”、“良能”说。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意思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了天赋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不需要经过学习和经过思考，所以称之为“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下》），

这就等于说它是先天就具有的，不是后天形成的。

在这里，孟轲把孔丘的“生而知之”说往前发展了一步。孔丘本来主张“生而知之”者只能是一部分“圣人”，而孟轲却把“良知”、“良能”说成是“人皆有之”（《告子上》）的人类本能。他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即人人都能做尧舜那样的“圣人”。

其实，孟轲在这里比起孔丘来多了一点欺骗性。在孟轲的心目中他认为具有“善性”，能够保存和扩充“良知”、“良能”的人，只有统治阶级的“君子”们，所以他自己就说得十分清楚：“庶人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下》），至于劳动人民他认为由于“放其良心”早就把“良知”、“良能”丢掉了。

按照孟轲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生来就是“善”的，具有天赋的“良知”、“良能”，反映在教学和学习的观点上，他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就是说，学习修养没有别的什么途径，不过是把丧失掉的，人所固有的“善心”、“良知”、“良能”寻找回来就是了。可见，孟轲主张的所谓做“学问”，是一种单纯向内心探索的功夫，而不是向客观实际学习，只要自己头脑中天赋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恢复回来就行了，这是一种十足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教学观点。

孟轲还承袭和发挥了孔丘的“上智”与“下愚”的观点。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说什么“后知后觉”的人，要靠“先知先觉”的人去启发才能觉悟（《万章上》）。在他看来，“先知先觉”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君子”，而“后知后觉”的就是被他视为群氓的劳动人民。

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说教，目的无非是企图论证所谓“先知先觉”的“天才”人物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成为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曾自我吹嘘地把自己打扮为这种“超乎其

类，拔乎其萃”的“天才”人物。他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轲这样的吹牛，正好说明他的剥削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狂妄已经膨胀到了极点。

但是，作为一位教育家的孟轲，他对教育的作用却是充满信心的，他不仅重视而且热爱教育事业，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列为“君子三乐”之一（《尽心上》），他的这点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人的任何正确思想只能是从社会实践中来。毛主席说：“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实践论》）实践出智慧，实践出真知，任何伟大人物的智慧和才能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同样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才能的获得、提高和发挥，主要取决于后天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接受教育的程度如何。因而，到底是遵循“生而知之”的求知路线抑是遵循“学而知之”的求知路线，这是唯心主义教学思想与唯物主义教学思想的重大分歧。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以阶级和政治地位来划分人的知识才能等级那更是荒谬的。人的知识和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任何人从无知到有知，从没有才能到有才能，关键在于努力学习和艰苦实践。有的原先知识较少，能力较差的人，由于后来刻苦钻研，就会使知识和能力得到迅速提高。相反，一些智慧、才能获得较早发展的人，如果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再勤学苦练，他的智慧和才能不但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还会倒退，可见，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汉代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时期，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为了对人民进行麻醉和欺骗，在思想教育领域里加强了唯心主义的宣传，并逐步提高儒学的地位。董仲舒适应这个需要，提出了“性三品”的唯心主义人性论，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并把它神学化。

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天生的，是“天”赋予的。他把人性分为三等：一等是“圣人之性”（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及其理论家等），二等是“中民之性”（一般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三等是“斗筭之性”（“斗筭”即指广大的劳动人民）（《春秋繁露·实性》）。

他认为“圣人”是能够“法天而立道”（《前汉书》·《董仲舒传》《对策一》）的，他们与天沟通，体察天意，代天行事，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者”（《春秋繁露·郊语》），他们是一些“知天地鬼神”，知“人事成败”，知“古往今来”的特殊人物，并且圣人所说的那套道理和天地的意志处于同等的地位（《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圣人之道，同诸天地”）。在这里董仲舒把“圣人”从“生而知之”进而说成是“神而先知”，董仲舒的思想完全发展成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先验论。

相反的，董仲舒却把劳动人民视为“斗筭之性”，生来就是恶的。他说：“民之号，取之瞑（愚昧）也”，“民之为言，固犹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借用“民”，“瞑”相通的字义，认为劳动人民是天生冥顽昏昧的，必须接受统治者的教训改造。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实质就是“天生的聪明论”与“天生的愚蠢论”的再版，他的政治目的在于以此为理论来论证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的天然合理性，欺骗劳动人民去驯服地接受地主阶级的教化和奴役。

唐代的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又对孟轲以来

的人性论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韩昌黎全集：原性》）性是生来就有的，情是接触事物后产生的。他又认为：“性之品有三”（《原性》），按照封建地主的等级标准，韩愈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他并忠实地信奉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把所谓“上品”与“下品”的等级鸿沟说成是先天划定，不可逾越的，上等性是善的，下等性是恶的。

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体现在教育、教学上就是他所主张的“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原性》）。依照韩愈的逻辑，凡属统治阶级的上层，他们都是“上品”，他们接受教育后就愈加聪明；凡是劳动人民都是“下品”，是不堪教育的，只能用刑罚来制裁，才能令他们慑于统治者的威势而不敢犯罪。韩愈上述的唯心主义的教育、教学观点与董仲舒一样都是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服务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宋元明清时代已经是处于后期的阶段了。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日趋腐朽，在思想教育上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更加神秘和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理论。程朱理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起的，并得宋以后历代反动阶级的推崇，程朱理学继承了孔孟之道的衣钵又把它向前发展，程朱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狂热鼓吹者。

二程（程颢、程颐）把知识、才能完全看作是人头脑中所固有的，先天就具备了。他们说：“人心莫不有知”，“知者吾之所固有”，“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二程遗书》卷十一、二十五）就是说，知识是内心固有的，也就是先验的。

因此，在教学，学习上二程极力主张唯心主义的求知路

线。他们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所谓“求于内”就是只强调闭门思索，发挥自己内心的精神修养，如果人们“求于外”向客观世界去寻找真理，就会被指责为“本末倒置”而被戴上“非圣人之学”的帽子。

二程又发展了孔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提出“气禀”的观点。他们说：“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愚”（《二程遗书》卷十八）。这就是说人的才干不是从实践中，学习中锻炼出来的，而是得之于神秘主义的“气”。统治阶级之所以“贤”和被统治阶级之所以“愚”，都是由于“气禀”所赋予，是天生如此的，不可能改变的。二程的这种理论比起孔丘、孟轲来更加富于神秘主义的色彩。

朱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则更为精致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大学章句》），就是说人生来心里就具有关于各种各样事物的知识。他又说：“上知生知之资……不待学而能”（《朱子语类》卷四），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他们不需要通过学习就具有种种的知识和才能。他根本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得到发展和深化。

他说什么“圣人”之所以是“聪明睿智”的，是因为天降生他的时候，是用“清气”造成的，由于他的禀气“清明纯粹”，所以他的才能和智慧生来就比一般人高。

至于劳动人民则是“愚昧无知”的，因为天降生他的时候，是由“浊气”造成的，“资禀既偏，又有所蔽”（《朱子语类》卷四），所以他们是天生的“愚蠢”，需要“圣人”来教育和改造。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圣人”好比“宝珠”在清凉的水中，自然明亮，而“愚不肖”（指劳动人民）好比珠子落在“浊水”中，必须去掉污泥浊水才能发光。朱熹这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企图为地

主阶级加强对农民的专政制造理论根据。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与他的先辈一样渗透着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明代王守仁的“心学”，是以孟轲的唯心主义“良知”说为基础的，他把孟轲的“良知”引向了唯我论。王守仁讲“良知”，把孟轲所讲的“不虑而知”的天赋观念加以发挥，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在天赋观念之中，个人的天赋观念创造了一切，这是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王守仁说：“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可见他所宣扬的“良知”，也就是孟轲所讲不需要经过学习的、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先验知识和才能。

因此，王守仁指出：教学和学习的目的即在于学为“圣人”，在于恢复各人固有的“良知”。

王守仁在口头上也谈什么：“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似乎他不承认有什么“上智”、“下愚”的区别，但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其实，紧接着他自己又明确地说：“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这圣愚之所由分也。”（《同上》）可见后一句话才是他的真意。

王守仁认为：人的气质生来就有“清浊粹驳”的不同，所以就有“圣人”和“愚夫愚妇”的区别。“圣人”具有“清明”或“清粹”的气质，好比精金，成色很纯，没有任何铜铅的杂质。虽然“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的不同，如金子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分量虽不同，但都是纯金，故都是“圣人”。因此“圣人”不经过学习锻炼，他的言行自然合乎“天理”，所以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他打了一个比方：“圣人”的“心”好比一面镜子，非常明亮，毫无灰尘“无物照”，所以也就不需要去磨刮，自然干净（参见《传习录上》）。

至于“愚夫愚妇”生来质量不纯，分量又轻，所以需要“教

化”，“教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才能，而是去掉杂质。他认为“愚夫愚妇”的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心”好比一面非常肮脏，积满灰尘的镜子，需要磨擦才能去掉斑点。王守仁的这些观点，无非是说，劳动人民天生是愚昧无知的，不能也不应该掌握文化知识，可见王守仁的唯心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愚民哲学。

总而言之，从孔丘到王守仁，他们所宣扬的唯心主义的求知路线，尽管在理论上愈来愈精致，不断出现新的花样，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鼓吹的都是天赋观念论，唯心主义天才论和英雄史观。这些都是“生而知之”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个古老的先验论命题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他们的唯心主义求知路线和教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玩弄了许多新奇的手法和隐晦的词句。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巩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教育路线服务的。

（二）博学、慎思、笃行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的教育家在“生而知之”的求知路线思想的指导下，对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理论的阐明也是唯心主义的。概括来说：就是他们极端地鄙视感性认识，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轻视甚至排斥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和变革。

在春秋末期，孔丘曾经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他虽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提出过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的思想 and 理论，但是，他对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的各个因素，如：“学”、“思”、“行”等都接触到了，并且发表了不少议论，他的这些观点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教学工作有过很深远的影响。例

如，他曾说过：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孔丘关于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的观点是比较复杂的，就其基本倾向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也有一些唯物主义因素，这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例如：孔丘所谓的“学”，它的主要内容是“学礼”、“学诗”、“学文”（“君子博学于文”《雍也》）、“学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学干禄”（“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等一类的东西。

可见，孔丘“学”的主要是一些古代的文化典籍以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奴隶制的一些条条框框。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这堆故纸堆中来领会“圣人之言”或“先王之道”。他没有研究客观现实世界的意思，他对学“圃”、学“稼”等一切有关生产的实际知识也是鄙视的，把它排斥在他的教学内容之外。

孔丘所谓的“思”，在不少情况下也不是指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而向理性认识过渡的意思，而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观反省。例如，他说：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季氏》）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

上面所举的“思恭”、“思忠”、“思敬”、“思义”等等实际上是孔丘提倡人们一言一行都要进行反复考虑和自我反省，看它是否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忠”、“义”、“敬”、“恭”的政治原则

和道德规范。

至于孔丘所谓的“行”，并不是接触客观世界，参加实践的意思。只不过是个人的一些“德行”，或履行“孝”、“悌”、“忠”、“信”一类的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行为。例如，他说：

“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

“行己有耻。”（《子路》）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孔丘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了要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首先要做一个在家则孝顺父母，出外便尊敬兄长，竭力履行奴隶制道德准则的人，如果有剩余的力量，才去学习文化知识。可见孔丘把履行奴隶制的“德行”看得比学习文化知识还重要。

总而言之，孔丘的“学”、“思”、“行”的内容多局限于“礼、乐、诗、书”的奴隶制思想文化以及政治、人事、道德的范围之内，至于变革自然现实的实践，他是没有涉及的。

但是，在孔丘的教学或学习过程的理论也还有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东西。例如，他主张“多闻”、“多见”，也很重视实际材料和证据；他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说研究问题不要主观臆测，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自以为是。这些反对主观成见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在学习的认识过程中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可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教学思想体系的限制，他的教学认识过程方面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能很好的发挥。

在学习的认识过程中，孔丘还主张“学”与“思”相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是说，如果只死记一些知识，而经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消化，这样学习得

来的东西只能是稀里糊涂,就会毫无所得;同样,如果只是在那里冥思苦想而不去学习、掌握和吸取新的知识,那也会使自己疑惑不定,流于空想。孔丘这个思想对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后学,孔丘的门徒思孟学派在“学”、“思”、“行”教学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唯心主义的教学或学习过程的公式。这就是《中庸》一书中所说的: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的作者经过概括和提高,把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发展为五个步骤。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弗”是不的意思,“措”是停止,废休的意思。《中庸》的作者要求“君子”做学问或道德修养时,一定要把学习的五个步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坚持不懈,除非不搞,搞则务必搞清搞透,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别人用一十分力量便能做到的,自己就要把百分千分的力量用上去。

《中庸》的作者强调在教学和学习中要发挥人的勤奋刻苦的精神,这个观点是可取的,同时它要求人们必须严格的遵循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习次序,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教学或学习过程各个因素的联系性,它是孔丘以后唯心主义教学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它更加严密化、系统化、完整化了。这一套教学过程或学习过程的理论,对于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教育、教学工作,对于古代学者的治学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古代教学理